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其需脚踏实地的实

现代民俗流变

证研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上海三联书店

仲富兰著

现代民俗流变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上海三联书店

仲富兰著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陆震伟

现代民俗流变

仲富兰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3 字数：193,000

印数：1-5,000

ISBN 7-5426-0299-3/G · 50

定价：7.50 元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总序

乌丙安

近几年展开的传统文化大讨论，已经形成了一种热力运动，由于各种真知灼见的不断增加，使得这场讨论本身更有意义和更加有生命力了。这很像是一支有鲜明主题旋律的多声部大合唱组曲的精采演出，越唱越雄壮有力了。但是，在这组曲中却少了民间的山歌野曲，多了些庙堂的清音雅乐。当我们赞颂广大人民的历史主体意识已经觉醒时，却往往对这主体意识觉醒前的沉睡缺乏全面的思索；习惯于对传统的上层精英文化给予较多瞩目，相对说来对民间文化领域却很少眷顾。这也许是人们追求高文化鄙弃野蛮愚昧的“下层”文化的积习所致，因为在那种“下层”文化里确实还沉淀着厚厚的原始文化积层。虽然我们无法证明全世界的民间文化都是如此，但是，我们确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至少在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化确实如此。

然而，中华的振兴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并不以学术界对哪些文化感兴趣为转移，它必将促使当代思想文化界对代表56个民族10亿人民的民间文化作出认真的探索。这套《中华本土文化丛书》将用大量调查研究的科学成果对民间文化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通过考察实证揭示中华大地上“活化石”和“活古代”的诸文化相，从而回答传统文化中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

问题。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我们就不能仅仅以上层文化为标准进行诠释和论争，因为在民间文化中还存着许多不同的标准，并通过它们的文化模式和类型显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关系常常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很大的分异，很难用同一的概念和模式加以简单地归纳。因此，对于民间文化的调查与实证研究将以比较直接的形式帮助人们去寻求民间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

对于民间文化的探索，只靠翻阅历代文化典籍和野史笔记去了解，不仅远远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历代典籍的编著者对民间文化多有偏见，常常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困难，造成错觉，甚至引寻出谬误的结论。

民间文化的根基在民间，它有自身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它在世世代代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丰富多采的文化模式和规范。绝大多数民间文化事象几乎从不见经传，它们只贮存在人民生活的底层，展现在田野山乡。因此，对民间文化的探索只能采取调查实证的研究方法，别无他路。《中华本土文化丛书》的编者和作者，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引起思想文化界及广大读者的兴趣，并参加到向民间文化的深层求证的研究行列中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反思中，共同努力探寻出一条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未来的道路。

1988年5月15日

前 言

长期以来，传统的观点几乎都把民俗看作是田夫野老的陈规陋俗，古老文化遗留的“化石”。还有人认为民俗就是“乡民的文化”，要研究民俗，只有到祖国的边陲之地或少数民族的古老部落里去找寻，似乎繁华都市的现代文化同民俗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更有人以民间文学来代替民俗学的研究，采集一些民间歌谣，整理一些民间故事或传说，就称之为“民俗学研究”了。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大量民俗事象表明，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整体性。我们不妨以相沿甚久的元宵习俗为例。从汉王朝就开始年复一年举行的元宵节，把农历正月初一开始的春节喜庆气氛推到最高潮。在唐宋时代形成了满城灯火、万众欢腾的景象，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市井庶民百姓，几乎都卷入了节日的狂欢。由于它是民众的意愿和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一个集中表现，所以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始终不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总是赋予它以新的内容。直到现在，在祖国城乡各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民俗形式热烈欢庆这个节日。这就足以证明：民俗并不是“乡下人的专利品”，也不是“落后民族的土特产”。当然，就某些具体的风俗而言，由于其受到多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制约，在各地会有不同的情况，或

强化、或淡化、或变迁、或消亡，但是，作为总体的民俗，它将与人类社会共存亡，从而成为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一种永恒现象。

我们再看流行时俗，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时尚。任何一个社会，总是交错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无论是在社会激荡更新之时，还是在缓慢发展之际，这些矛盾的渗透和制约，总是不可抑制地表现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而且由民众的意愿和抉择，表现出世态民风的趋向，闪烁出历史发展的锋芒。这种社会时尚，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也是人们生活行为的过程和表现，并且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生活的主导。

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作为纲常礼教的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的规范作为道德的内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历代王朝都用礼制规定社会秩序，人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过着相应的生活，而不是单纯依凭财产的多寡，以此维护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的信条。

礼制对生活用品的规定，周详而又完备。有关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如衣冠服饰、房舍家具、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等，物无巨细，不论是花色、品种、质料还是造型和色彩，都作了严格的区分，贵贱不能混淆。与此相应的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婚丧喜庆等各种礼仪均各有定制，由此形成各个阶级、阶层和群体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享用不该享用的物品。历代统治者都以此作为世风良莠、名教盛衰的标准。因此，那种受封建礼制约束的行为模式往往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的。在这样的氛围中，拘谨、守成、俭约、厚朴，也就成为相应的民俗风情。这种社会时尚正是封建统治者津津乐道的最理想的社会模式。

然而，这样的世风和时尚不会持之久长，一旦社会生产复

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享受欲望就会膨胀，必然不可抑制地冲破封建礼制的约束，改变这种刻板的生活方式，并且以巨大的历史推进力，强烈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民风习俗。我们竖看历史，寻找社会民俗之演变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时，不难发现：每当社会时尚、习俗加速度地变化时，正是社会大变动的前夕，其变化速度和规模往往又成为民心趋向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在物质生活中冲击等级名分的结果，必然伴随着观念上背离传统礼教，突破旧有陋俗的羁绊。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成为社会变迁中的常见现象。也许正是这股恶性的情欲势力，动摇了高压在人性上的名教磐石，从而迸发出一股新鲜的活力。这股时尚变迁的新风，表现在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思维习惯、行为模式、文化心理、艺术趣味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潜移默化的变革。而这种变化首先就是民俗的变化、传统心理的变化，它对思想家们提炼时代思想之精萃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基础，并在经济和思想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鉴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再看今日改革开放态势下的都市社会风尚，对时下流行的时俗就不会感到诧异莫名了。流行时俗是都市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民俗事象，它一旦风行之时，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无不受到感染，群起仿效，趋之若鹜；风行过后，逐渐式微，又会有新的时俗流行。这些流行的社会时尚，既不是古代的“遗留物”，也不是孤立地发生在都市之中，相反，它还会迅速向农村和边远地区辐射。事实证明：不仅都市居民有着自己的民俗，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和对外交往的发展，都市民俗文化也会不断萌发新的“产品”。每个时代思想的倾向，情感的波澜、艺术家的构思，不但从哲学、科学、政治、文艺中表现出来，而且也通过民俗文化及时地反映出来。以上海民

俗文化为例，它开埠至今不过 100 多年，便从一个万余人口的滨海小城发展为 1000 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由于上海地处江、浙、皖、赣等传统文化发达地区的边缘，因而这里人文荟萃，名物繁盛。在其开埠过程中，不仅各地民俗文化曾大量向上海集聚，而且大量的西方文化也在此驻足，然后扩散全国。古今中外的民俗文化在此大交融，合于近代生活的传统文化得到保留发扬，能为中国民众接受的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经过多年的熔炼，产生了独特的综合型的文化样式，有人干脆称之为“海派文化”。由于上海城市文化与经济关系密切，也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城市民俗文化。如在上海人相当明显的心理特点是讲究实效，人际交往中较精于“算计”，注重权利与义务，而对道义原则相对看得较轻。不同职业和不同层次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志趣爱好和价值取向，在民俗文化中表现了丰富的内容。此外，像南市这样的老城区，无论在建筑外貌和市民生活方式中都较别处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旧式城市的民俗特征；而商业区域与工业区域的市民素质也显示出一些微妙的区别；在有些地区甚至强烈地遗留着移民来源地区的文化，至今还使用母地的语言、习俗和特定的娱乐交往方式。

由此可知，民俗文化决不等同于文明民族中某些落后地区的奇风异俗，也不是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和掌故佚事。其实它是遍布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种族的、民族的、方言的）、任何形式的社区（村落、城镇、居民小区、机关大院、胡同里弄）或人群集团（年龄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等等）的文化现象。都市居民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思维习惯、人际关系，以及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体民俗事象，都应纳入民俗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之中。

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切忌从概念出发。本书的写作，既不想追随传统的民俗学体系，也与当今时髦的治学方法分道扬镳。生活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部硕大无朋的教科书，我试图从现实生活的大海里，撷取民俗流变的事象，深入剖析，然后再作一些理论的思考。我相信，只有建立在厚实的生活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目 录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总序

乌丙安

前 言

一	“诞生礼”和“四二一”综合症.....	1
	（一）“踩生”两面观	1
	（二）“提鸡报喜”的象征意义	4
	（三）长命锁、护身符和神灵观念	8
	（四）养育习俗的负效应	14
二	性别悲剧和生殖文化.....	17
	（一）弃女婴和女性悲剧	17
	（二）祈子法和生态平衡	22
	（三）“信物”和生殖崇拜	26
	（四）“性角色”的塑造和认同	33
三	在生命网络的联结点.....	38
	（一）期待生命的喜悦——“坐床喜”	38
	（二）庄严而神秘的命名符号	45
	（三）“生日”还是“人日”	51
	（四）“成丁礼”和“青春祭”	57
	（五）“龙年提前现象”和“属相”考辨	64
四	繁琐的“礼”和贫乏的“爱”.....	71
	（一）情意相契“同心结”	71

(二) 与命运抗争的“定情物”	75
(三) 明媒正娶和花轿	80
(四) 婚俗禘礼与早期集团交换原则	83
(五) 从“六礼”看扭曲的性爱	89
五 悲喜交加的丧礼	95
(一) “白喜事”辨析	95
(二) “海葬”的启示	101
(三) 黄陵祭祖和现代造坟	109
六 “文化表征”的精神意识	114
(一) 世态民风的“晴雨表”	114
(二) “只重衣衫不重人”	118
(三) 裙袍所潜藏的精神意识	122
(四) 服饰民俗与民间审美	130
七 色彩符号与流行时俗	137
(一) 色彩观念与等级符号	137
(二) 镌刻在人体上的文化符号	143
(三) 诸“热”并起与时俗流行	148
八 烹饪饮食和文化品味	155
(一) 鼎和饕餮所展现的饮食观念	155
(二) “圆台面”折射众生相	163
(三) “饼”和糕点源流	169
(四) “茶馆”的文化魅力	180
九 民居人情与文化差异	185
(一) “石库门”背后的文脉	185
(二) “亭子间”与上海人文心态	189
(三) 淡化中的邻里人情	191
(四) 人变得更加孤独了吗	196

十 “厕所问题”与现代文明	201
(一) “都厕”印着文明脚步	201
(二) 东邻“厕所日”的启示	206
十一 现代民俗反思余论	209
(一) 民俗的本质及其反思和变革	209
(二) 文化选择与习俗的多样性	215
(三) “崇雅抑俗”和文化观念更新	221
(四) 透视社会的广角镜	230
后 记	237

— “诞生礼”和

“四二一”综合症

(一)“踩生”两面观

我小时候，住在上海徐家汇。与我家为邻的一户人家生有五个女儿，街坊邻居都戏谑地称之为“五朵金花”。可是这对夫妇求子心切，执意要生个儿子才肯罢休。那一年，那位大妈果真又有了身孕。过年时，我的母亲要我领着两个弟弟去拜年。当我们兄弟三人在大年初一清晨叩开他们家门，向他们拜年，祝贺他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早生贵子时，这对夫妇大喜过望，高兴得合不拢嘴。我记不清当时他们朝我和弟弟口袋里塞了多少蜜枣、糖果和瓜子，也记不清他们说了多少夸奖我们兄弟如何“懂事”，如何地“有教养”之类的好话。

那一年，这位大妈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自然这只是一种巧合。但这对夫妇在高兴之余，却坚信是由于我们这几个男孩子大年初一“拜年”的结果。说来好笑，当他们的新生儿呱呱落地后，在选择“踩生”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当时，我确实感到好像获得了一份“殊荣”，兴匆匆地走到产房里，仔细地对着这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端详”了一番。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我是如何结束这次“踩生”的，只记得闭着眼睛的婴儿突然之间发出了一阵啼哭，我吓得退了出来。如今，36年过去了，那被我“踩生”的婴儿早已长成个壮实的男子汉。令人痛心的是，

这位由我“踩生”的男孩，后来由于受到父母的过分溺爱，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羁押在幽暗的铁窗之中。

看来，我的“踩生”并不那么灵验，由此不禁使我想到国人生育时的诞生礼俗。“踩生”是我国民间流行相当普遍的一个习俗。婴儿呱呱来到人世间，第一个来到产房里的外人，即为“踩生人”。通常，生孩子的人家都希望请品、行、才、貌俱佳的人与婴儿照面。据说，这意味着这个婴儿长大成人后在性情、品行乃至容貌上也会像这个来“踩生”的人。

这种风俗在我国不少民族中都普遍存在。例如，湘西的古夜郎人相信征兆，他们都希望“好人”踩生。但一般的人又以为进了产房、踩了血地后不吉利，会“招灾惹祸”，都不愿“踩生”。因此主人家会热情款待踩生的人，孩子满月后，父母要送给踩生人礼物，以示酬谢。满族人也有类似习俗，为了使孩子将来能有理想的性情，他们总是如同躲避瘟疫似的阻止品行不好的人进产房。土家族人则认为“踩生”的人分给了婴儿“衣禄”，因此总是以酒款待，让“踩生”者吃饱吃好。侗族人“踩生”的概念又别具一格，若生男孩，则请女客第一个进屋；若生女孩，则请男客踩生，否则的话，主人则认为孩子长大会没出息，会很不高兴。

我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都流行“踩生”习俗，但在另一些少数民族中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禁忌，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时时提防着外人“踩”进产房的门槛。

云南蒙古族的产妇不满月，禁忌外人进入产房，否则的话，则会被认为是“踩断了奶”，婴儿无奶，百病俱发。为了警示来人，他们按照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在门外挂顶箴帽。来者见到箴帽，自然望而却步。

羌族以红旗为门标，傣族则在楼梯的木柱上挂竹皮编制的

星星，这些都是忌生人入产房的标志。哈尼族人在婴儿出生后的三日里，除同宗妇人或外祖母外，忌讳他人进屋，为此在门头悬挂笋叶剪成的人像、红泡刺、野姜叶和锯形木刀等标志。外人若不知哈尼风俗，冒失地闯进了“月子房”，家里人便立即将一块通红的火炭浸入小盆水中，并用手指蘸一点盆中的水向婴儿身上弹去，以示除邪。

侗族以柔草缚鸡翅毛，另加一块布（生男用红布，生女用青蓝布）于其上，挂于门前以示非至亲莫入。居住在广西境内的瑶民，生儿生女的当天，就在家门前插些符号，如用新生青草扎小小人，以示婴儿降落人间，一般不欢迎客人进门。

看来是相互矛盾的，一种是欢迎“踩生”，另一种则是对“踩生”的禁忌。其实，就其本质而言，两者恰恰分别体现了人们对新生命降临人世的祝福和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儿的出世，父母和长辈都希望这个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和远大的前程，在“诞生礼”的各种庆贺习俗上，大抵都贯串着这种心理因素。同样，当新生儿出世时，拒绝任何外人接触，这也与我国传统的“婚姻即生殖”、“早子早福”的浓厚意识相联系。在这种浓厚意识的支配下，人们从小就开始积淀着早生、多生的观念，婚姻被认定以生殖繁衍、“膝下有子”及“养儿防老”为目的。我国传统的家庭类型基本上是属于生育型的，不育的家庭和少育的家庭受到歧视。再加上传统农业社会，经济贫困，生计艰难，人口存活率很低，对于死亡的恐惧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拒绝“踩生”的种种禁忌习俗就不难理解了。

民间对“踩生”的庆贺和禁忌这两个绝然不同的习俗，从两个侧面，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生殖文化的两大特点，“两极相通”。它们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世代代

的中国人的影响也特别深刻。

(二) “提鸡报喜”的象征意义

到目前为止,民间对婚后怀孕的妇女仍称之为“有喜”。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生了一个儿子。尽管他们夫妇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孩子诞生的“三朝”过后,那位做父亲的依然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了“喜蛋”。看来,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时代怎样发展,“报喜”的习俗是难以泯灭的。这所谓“喜”,是人们对于迎接新生命诞生的一种共同的喜悦,含有强烈的民俗特色。我国各民族中这方面的习俗很普遍,其中不乏有趣的例子。

在汉族中,比较流行的是得子后去外婆家报喜,称为“送喜果”。报喜前,新生儿的父亲得悉心准备,通常需备荔枝、龙眼、花生及染成红色的鸡蛋等礼物。红喜蛋之数,生男为单,生女为双(也有的地区生女不送红喜蛋)。送喜果时通知第三日洗儿。外婆家接礼后,随即备喜蛋、衣裙等物回送,所送喜蛋须视所受之数加倍。接到外婆家所送的喜蛋后,按男单女双之数分送亲友,而亲友也以火腿、桂圆等物回报。这一习俗在现代乡村依然盛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发喜糖”、“发红蛋”的习俗正是当年“送喜果”习俗的沿习和继续。

在少数民族的诞生礼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鄂西土家族人的“提鸡报喜”。女人生头胎的当天,夫家就要备上两斤酒、两斤肉、两斤糖、一只鸡,一般由女婿去岳母家报喜。娘家只要看报喜带来的是公鸡还是母鸡,即可知道女儿生下的新生儿的性别。通常公鸡表示生男孩,母鸡表示生女孩,双鸡则表示是双胞胎。娘家得了喜信,先要祭祖,告诉祖宗又添后人了。女婿报喜则要讲一套“古老话”,若生男孩便说:“得了海中龙子,